



星漢灿烂

——《周恩来选集》上卷中的烈士传略

星 汉 灿 烂

——《周恩来选集》上卷中的烈士传略

朱适 等

中国青年出版社

封面设计：张歌明

封面题字：陈叔亮

尾花：肖星

星汉灿烂

朱适等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787×1092 1/32 10 印张 170 千字

1981年8月北京第1版 1981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57,000 册 定价 0.70 元

编者的话

在《周恩来选集》上卷的许多文章中，周恩来同志以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追怀和悼念在民主革命期间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献身的许多革命烈士。烈士们有的是在战火硝烟中洒血疆场；有的是在刑场上面对敌人的屠刀英勇就义；有的是在法西斯特务的枪口下惨遭暗害；……“英雄洒热血，化作红杜鹃”，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不正是千千万万革命烈士前仆后继，用他们的鲜血和生命换取来的吗？“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在风雨如磐的旧中国，烈士们英勇、悲壮的光辉事迹，唤醒和激励过无数的革命者披荆斩棘去夺取胜利。今天，在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长征中，也必将鼓舞新中国的青年去创造无愧于革命先辈的英雄业绩。

为了帮助青年学习周恩来同志的著作和革命先辈们的高贵品质，我们将《周恩来选集》上卷讲到的四十二位革命烈士的生平业绩，编成这本读物。对于大家熟悉的革命先烈，着重

介绍周恩来著作中讲到的有关活动。书中人物是按《周恩来选集》上卷中出现的先后顺序编排的。

我们深感遗憾的是，虽然经过多方努力，但对个别先烈，例如邢士贞的生平仍然了解得很不够，这次只好暂缺介绍。我们希望知道这些烈士生平的同志，能够把先烈的光辉事迹记录下来，让典范长存，丰碑矗立。

谨向为本书提供资料的同志，特别是烈士们的亲属致谢。
希望广大读者对本书给予批评、指正。

一九八一年五月

目 次

廖仲恺	1	彭雪枫	101
卢冬生	10	陈潭秋	108
汪 铭	19	何叔衡	117
彭 澈	27	宣中华	123
杨 殷	36	侯绍裘	128
颜昌颐	44	李大钊	136
项 英	50	于方舟	145
唐在刚	56	邓演达	150
彭 融	60	鲁 易	158
董振堂	67	彭汉垣	163
朱 瑞	71	陈延年	166
杨虎城	79	张太雷	176
杜重远	86	蒋先云	184
许权中	95	朱克靖	194

史量才	204	博 古	257
杨杏佛	210	叶 挺	263
瞿秋白	216	邓 发	273
恽代英	225	黄齐生	280
李明瑞	234	李公朴	287
陈赞贤	243	闻一多	295
王若飞	249	杨 杰	306



乙十乙十乙十乙十乙十乙十乙十乙十



廖仲恺

廖仲恺是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坚定战士，激进的资产阶级革命家，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左派的一面光辉旗帜。周恩来在《关于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一文中，赞扬他是“资产阶级左派的坚强的代表”。

探索解决中国问题的途径

廖仲恺原名恩煦，又名夷白，广东省归善县（今惠阳县）鸭仔步村人。他的父亲廖竹宾是客家人，因家庭贫寒，早年卖身为“猪仔”，被运送到美国当华工，后来积聚所得，成为商人，曾任职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汇丰银行分行，是一位热爱祖国的旅美华侨。廖仲恺于一八七七年四月二十三日出生于旧金山，少年时在美国读书。

当时，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侨居国外的中国人都备受欺凌。在美国的华工、华侨的遭遇也是如此。他们不但在经

济上受着苛捐杂税的剥削，在法律上同黑人、印第安人一样受到种族歧视和压迫，在生活上过着“欲饮无浆，欲饭无粮，霜欺雪虐，风雨傍徨”的苦难日子，而且还不时遭到排华风潮的祸害。廖仲恺童年时，就从父母口中听到过许多关于华工、华侨遭受迫害的惨事。年纪稍大，又亲眼看到一些华人遭受外国人的嘲笑和戏弄，以及中国儿童被美国富人的孩子欺凌和辱骂的情景。帝国主义的凶残，祖国的孱弱，在廖仲恺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爱国思想开始萌发，并逐渐滋长了救国的愿望。

一八九三年，廖仲恺的父亲在旧金山病故。就在这一年，他结束了在美国的侨居生活，陪同母亲回到了祖国。

一八九四年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战败之后，以学习西方、寻求救国方法为中心的维新运动在国内广泛展开。廖仲恺归国后，深受维新思想的影响，放弃了原来的参加科举考试的打算，于一八九六年赴香港攻读英语，为学习西方、拯救中国作准备。

当时，国内知识青年受民族危机的刺激，纷纷到国外去寻求救国真理，出洋留学的风气盛极一时，其中以到日本留学的最多。廖仲恺也有了到日本留学的愿望。他的夫人何香凝变卖首饰，支持他出洋留学。廖仲恺于一九〇二年秋，东渡日本，先后入早稻田大学经济预科、中央大学政治经济科学习。

廖仲恺在东京留学期间，结识了朱执信、黎仲实、苏曼殊、胡汉民等革命青年，受他们的影响，萌发了反清革命思想。一九〇三年九月，他偕何香凝专程前往孙中山寓所进行访问，聆

听孙中山谈论革命道理和救国方法，随即参加了孙中山所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开始从事推翻清朝统治的斗争。

一九〇五年九月一日，廖仲恺经何香凝介绍，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并担任同盟会总部外务部干事。同年，被选为中国留学生会会长，经常同留学生中的保皇分子进行斗争。为了配合孙中山的学说的宣传，廖仲恺在一九〇五年出版的《民报》第一号上，发表了他翻译的亨利·乔治所著《进步与贫困》一书的部分译文。

辛亥革命后，廖仲恺参与了南北议和，并一度回广东，任广东省军政府总参议，兼理财政。稍后，曾去北京策动议员反袁世凯，险些遭到袁的逮捕。一九一三年，“二次革命”失败，他随孙中山再度亡命日本。一九一四年中华革命党组成，他被选任党的财政部副部长。此后，奔走于上海、广东等地，协同孙中山从事反袁、“护法”斗争，在筹措革命经费和组织革命力量的活动上，出了很大的力，成为孙中山得力的助手之一。

一九一八年夏，“护法”运动失败，廖仲恺随孙中山离开广州到上海。一九一九年八月，他和朱执信、胡汉民等创办了《建设》杂志，积极阐发和传播孙中山的学说。此后两年，他译成了《进步与贫困》和威尔科克斯的《全民政治》等书，还不断在《星期评论》、《民国日报》、《建设》杂志上发表文章，探索解决中国问题的途径。由于没有认识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根本问题，不可能找到正确的出路。

随着历史的发展，廖仲恺在接受历次革命失败的深刻教训的同时，受到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的影响，开始看出中国问题的根源“就是政治上的障碍”，初步理解到欧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一些黑暗面的症结所在。因此，他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表示了极大的希望，指出：“俄国革命以后，私有废除，生产分配之事，掌诸国家机关与人民合作社，空前之举，震慑全球，前途曙光，必然出人群于黑暗”。

一九二一年，孙中山回广东就任中华民国政府非常大总统。廖仲恺担任财政部次长、广东省财政厅长，用全力整理财务，筹措军费，支持孙中山出兵北伐。一九二二年六月，陈炯明叛变，廖仲恺被囚六十多天。经何香凝等竭力营救，于八月十九日脱险后，他不仅不气馁，而且更加豪情焕发，立即乘船赴香港转上海，与孙中山会合，重新投入新的革命斗争。

国民党改组的坚强支柱

当孙中山在绝望里遇到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踏上新的革命征途时，廖仲恺给他以积极的支持和协助，并与他并肩前进。

一九二二年八月下旬，孙中山在上海同共产党人李大钊会谈之后，会见了苏俄全权大使越飞所派的代表。接着，为深入商谈联俄、联共问题，廖仲恺受孙中山委托，赴日本同越飞会谈。他们在东京交换了反对帝国主义及中苏联合的初步意见，后因日本特务跟踪，会谈中断。一九二三年一月，《孙文·越飞宣言》签订后，廖仲恺又奉派去日本再次同越飞会谈，商

量合作的具体问题，以便把联合宣言具体化。这次会谈，历时一个月，成为他思想转变的一个重要关键。通过同越飞的相处恳谈，廖仲恺对列宁领导的苏维埃俄国有了进一步了解，开始明确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从而竭诚拥护和全力支持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一九二三年春，叛军陈炯明败退后，孙中山回广州就任陆军大元帅。廖仲恺先后担任大元帅大本营财政部长和广东省长，积极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这年十月中旬，他和李大钊等五人担任筹划改组国民党事宜的改组委员，从事改订党章等工作；同月下旬，召集国民党特别会议，商讨改组问题；后来又和谭平山、胡汉民等九人担任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积极参与改组的筹备工作。十一月底，他奉命到上海与各省支部商讨改组问题，组成了上海临时执行委员会，负责该地区的国民党改组工作。

一九二四年一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廖仲恺在大会上详细讲述了国民党改组的必要，竭力赞扬《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坚决表示今后“必须以此宣言为奋斗前进之标准，努力前进！”这次代表大会的成功，标志着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合作的正式开始。

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过程中，国民党右派如冯自由、张继等人公开反对改组，使用一切卑劣手段进行阻挠和破坏。在这一场激烈斗争中，廖仲恺竭力协助孙中山，同右派势力进

行了不调和的斗争。他很勇敢很坚决地干，毫不妥协和动摇，宣称“我为国家，为本党，无论何人反对，我皆不畏。即击我杀我，亦在所不惜。”廖仲恺在国民党改组的整个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是始终赞助最力的一人，是国民党改组的坚强支柱。

国民党改组后，廖仲恺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政治委员会委员，除继续担任广东省长、财政部长外，并先后兼任国民党工人部长、农民部长、黄埔军校党代表、军需总监和大元帅大本营秘书长等要职。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通过实际斗争的锻炼，廖仲恺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他对民主革命有了较为明确的认识，形成了比较正确的观点，成长为坚定的国民党左派，走上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正确道路。

三大政策的忠实执行者， “无产阶级的好朋友”

国共合作后，廖仲恺较清楚地认识到：“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运动，对内要打倒军阀官僚及一切反动力量，对外要抵抗帝国主义者的重重压迫。”并明确指出：“官僚军阀与帝国主义者，是我们全国人民的公敌”。他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提出废除租界、治外法权的主张；此后，又多次发表讲演，用铁的事实揭露帝国主义侵华的罪行，号召人民起来同帝国主义斗争。他强调说：“吾人其不欲解决吾人之痛苦及谋国

家人民之丰富则已，否则必须与帝国资本主义者战！吾人其不欲打退帝国资本主义者则已，否则必先与国内军阀战！”

廖仲恺竭力促成并忠实执行孙中山的联俄政策。他认为全世界只有俄国解决了社会制度问题，中国“若能够有所树立，除非是建立一社会主义的国家。”他歌颂列宁“是打破帝国主义的实行家”，“他所做的事都是为被压迫民族奋斗，为无产阶级而奋斗”。廖仲恺亲切地接待苏俄派来帮助中国革命工作的友人，诚恳地和他们共事。

廖仲恺坚决执行孙中山的联共政策。他排除了国民党内右派顽固势力的种种破坏，促成了这一政策的实行。他坚信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是国民党起死复生，成为“一个新生命”的重要因素。他明确指出：“想要打倒帝国主义，非与共产党亲善不可”。因此，他一直支持中国共产党人在广州革命政府的党、政、军各机关中公开活动。他在担任国民党中央工人部长期间，凡是关于工人运动方面的工作，都虚心听取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意见，并且本着与共产党热诚合作的精神，把领导工会的事情都交给工人部秘书、共产党人冯菊坡处理。在黄埔军校任党代表时，他很敬佩当时担任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和周恩来亲密地团结共事，经常在一起研讨问题，保持着真诚的合作关系。廖仲恺同共产党人这种真正的合作关系，成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合作表现在具体工作上的典范。

廖仲恺执行孙中山的扶助农工的政策，更是非常认真，并全力以赴。他认识到“占我国人口最多的是农工阶级，那一派

替农工阶级打消压迫他们的力量，便是革命派。反言之，凡与军阀帝国主义者妥协，并压抑农工的人们，便是反革命派。”他同情农民减租减息和工人反对资本家的斗争，积极地赞助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维护工农利益。一九二五年六月省港大罢工中，香港罢工工人回到广州，廖仲恺封闭烟赌馆，作为工人住宿之所；拨出广州市的一些专款，作为工人的生活费用；并担任罢工委委员会顾问，竭力赞助罢工，支援罢工工人。他曾经到中山、东海等县农村去访问农民，支持农民同封建势力进行斗争，支持各地普遍建立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正因为廖仲恺在推动工农运动的发展中作出了可贵的贡献，从而使他由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成长为“无产阶级的好朋友”。

一九二五年孙中山逝世后，廖仲恺继承孙中山未竟的事业，更积极地为贯彻革命的三大政策而斗争。同年三月，他参加了讨伐陈炯明的东征战争。六月，又参加了镇压与帝国主义相勾结的杨希闵、刘震寰叛乱事件。黄埔军校师生讲述廖仲恺当时的活动情况说：“我们又亲眼看见：为了东江战争，每天作十点钟工作，还要穿着草鞋，领导我们去打仗；杨、刘作战的时候，晚上二时以后，单独一个人还要由黄埔回到广州去办事。”他这种为革命工作献身的精神是可贵的。苏联代表、国民党特别顾问鲍罗廷，赞扬廖仲恺为革命做了很多实际工作，说象他“这样得力而实干的人，可惜太少了！”

正由于廖仲恺不屈不挠地坚决为贯彻革命的三大政策而战斗，帝国主义分子和国民党右派对他极端仇恨，必欲置之于死地。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日，廖仲恺偕同何香凝去参加国

民党中央常务会议，就在中央党部大门前，遭到国民党右派所指使的暴徒的暗杀，为民主革命献出了生命。

廖仲恺的革命活动，是和孙中山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廖仲恺为了国家的独立、统一和民族的解放，始终无所畏惧地英勇战斗，在中国民主革命中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尚明轩)





卢冬生

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七日，周恩来在给贺龙和湘鄂西前委的信（即《关于湘鄂西苏区发展的几个问题》）中，第一段话即是：“去年年底卢冬生同志来，得到你们的报告……。信系由冬生同志带回去的，想现在已经收到了。”信中提到的卢冬生，从一个牧童成长为红军的将领，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历程。

苦难的童年

卢冬生，一九〇八年三月十六日生于湖南省湘潭史家坳，父亲是佃农，家境贫困。卢冬生刚刚七岁，就不得不不到宁乡给一户姓陈的人家当牧童。后来成为我军重要将领的陈赓，是这家的“二少爷”，当时正在东山学堂上学，他比卢冬生大五岁，时常关心、帮助这个小牧童。一九一六年，十三岁的陈赓高小未毕业，就抱着要到外面创造一番事业的雄心和要对国家、社会有所作为的志愿，偷偷离家，到唐生智的部队当了兵。